

从“不远不近”到“事实同盟”

——试论1951至1965年间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演变

韩晓青

内容提要 中巴建交之初,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并不是十分密切,可以说是“不远不近”。以后美巴两国走向结盟,更是给中巴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改变,抓住有利时机,最终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扭转。之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

关键词 中巴关系 发展演变 事实同盟

韩晓青,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师 100091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5.06.021

中国和巴基斯坦被誉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典范”,两国被称为“全天候的朋友”。但两国关系在建交之初并不是如此密切,两国关系也是在经历了一定的波折之后,才由建交之初的“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发展成为之后的“事实同盟”。之后,在这个基础上两国关系不断发展,最终才形成了如今的这种“全天候的朋友”关系。这一时期,中巴两国关系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一个演变过程呢?有哪些关键环节促使两国关系不断靠近呢?本文试着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对这一时期中巴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

一、建交之初中巴关系的“不远不近”

1. 中国和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巨大差异

新中国外交政策最突出的特性就是独立自主。根据历史和现实,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三条重要的方针,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这三条重要的外交方针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而巴基斯坦的独立,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最终和印度民族主义力量妥协的结果。巴基斯坦独立之初外交政策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为了保证和促进巴基斯坦的生存、发展和壮大。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巴基斯坦独立之初在外交政策方面一度曾设想和印度进行联防。巴基斯坦的领导人曾多次表

本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资助中央党校2014年度校级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达过这种意思。巴基斯坦的第一任总督^[1]真纳强调说：“对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说，以友好的方式合作，在陆地和海上反对侵略以共同防卫它们的边疆是至关重要的。”^[2]但是印度领导人对巴基斯坦的建议一直是不屑一顾，这样，在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印巴联防”的建议和设想仅仅停留在设想的阶段，并没有得到实现。此外，独立之初的巴基斯坦在外交方面还十分看重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加强穆斯林世界对巴基斯坦这个新独立国家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以取得穆斯林世界对巴基斯坦国家建设方面的支持。

除了外交政策的不同，新中国和巴基斯坦不论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等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新中国是一个以马克思理论、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巴基斯坦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民族主义国家；经济模式上，新中国的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公有制方向发展，而巴基斯坦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当时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以上这些因素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2. 中巴建交后的初步交往

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新中国和巴基斯坦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中巴两国作为邻国，双方对相互之间存在的潜在的共同利益以及合作机会同样不能忽视。出于种种现实因素的考虑，中巴两国摒弃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虑，在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巴正式建交后，中国对发展中巴关系是相当重视的，除了日常礼节性的交往之外，还积极参加了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工业展览会^[3]，和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巴之间的第一个贸易协定^[4]，开通了两国之间的无线电报^[5]，方便了两国人民的通信往来。

巴基斯坦对发展中巴友谊也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日常礼节性的友好交往外，巴基斯坦友好人士积极筹组巴中友好协会^[6]，另外在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上，巴基斯坦曾多次表示支持新中国^[7]，巴基斯坦还积极邀请中国参加1952年在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工业展览会，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停留巴基斯坦期间也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招待^[8]。巴基斯坦对在北京举办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从筹备到召开，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9]。

但综观中巴建交之初的交往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巴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缓慢和低水平的特点，中巴双方的交往主要限于一些礼节性、民间事务的往来，双方高层领导人之间没有往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双方也没有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并且双方在交往中也是小心翼翼。例如，中巴建交后，巴基斯

[1]1947年8月至1956年3月，巴基斯坦实行总督制，总督相当于总统。1956年3月23日，巴基斯坦公布了第一部宪法，改名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改总督制为总统制。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成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

[2]孙士海等主编：《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3]《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开幕 我代表团应邀赴喀喇蚩参加》，〔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3月11日。参见《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闭幕 中国馆观众达三百万 巴基斯坦人民一致赞扬我国成就》，〔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4月23日。《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闭幕 中国馆观众达三百万 巴基斯坦人民一致赞扬我国成就》，〔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4月23日。《巴中友协举行盛大茶会 欢送我国参加工展代表团》，〔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4月28日。

[4]《我国和巴基斯坦签定棉花协定和煤合同》，〔北京〕《人民日报》1953年3月17日。

[5]《中国和巴基斯坦间 直达无线电报开放》，〔北京〕《人民日报》1953年3月1日。

[6]《巴基斯坦人民筹组巴中友协》，〔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9月4日。

[7]《苏联在联合国远东经委会上 提议邀请我代表出席 提案竟被美、澳等代表否决》，〔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3月7日。《巴基斯坦两届总理对外政策言论摘要》（1956年3月1日-1956年3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527-04。

[8]《我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已返京 在巴基斯坦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4日。

[9]《巴基斯坦举行全国和平大会 决议欢迎在北京召开和平会议 并猛烈谴责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北京〕《人民日报》1952年5月26日。

坦的友好人士积极筹组巴中友好协会,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外交部在1951年9月29日致电时任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韩念龙,详细说明了中方的顾虑和态度。电报指出“关于巴国进步分子筹组巴中友协事。同意你们意见。巴中友协是公开合法的,最好以该国中上层人士为主,有若干政府官员参加,包括各阶层的广泛的组织。发起人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号召力量。如果只是狭窄的左翼团体,致不能公开合法存在,作用也就减少了。此种希望,可在适当场合,仍由周南向该筹委会人士说明,并表示俟该会正式成立,在中巴文化交流方面,使馆当予以协助。不要给他们以我方过分冷淡的感觉。”^[1]

当1951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纪念日,巴中友协曾向中国政府发来了贺电,但是中国方面当时还不确定巴中友协是不是公开的组织,因此,直到1951年10月9日,中国的国庆典礼已经接近尾声,中方才在《人民日报》上刊载消息^[2]。巴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后,举行首次招待会,中方当时的态度也是审慎的。1951年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就此事致电驻巴大使韩念龙,指出:“巴中友协既可合法存在。其招待会可派参赞或秘书参加。如请讲话,可表示祝贺,并望为增进巴中人民友谊而努力,讲辞宜简。至华侨被邀请参加招待会,可斟量参加,惟不宜入会为会员。”^[3]

二、美巴结盟及对中巴关系的影响

1954年5月19日,美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签订;同年9月8日,巴基斯坦又加入了美国组织的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9月23日,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了“土耳其—伊拉克军事条约”,即“巴格达条约组织”(因为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最先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组织是美英主导的。上述三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巴基斯坦改变了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在外交上走上了美巴结盟的道路。美巴结盟对当时的中巴关系有哪些影响呢?

1. 美巴结盟

巴基斯坦独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和印度的威胁,其在外交方面试图走出一条独立自主具有自身特色道路,同时也寻求改善自身的经济情况,以对抗印度。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巴基斯坦发现最初制定的外交政策并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向巴基斯坦伸出了橄榄枝。

首先,美国帮助巴基斯坦解决了粮食问题。1947年的印巴分治无论给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打乱了原来的经济发展秩序和统一的市场。和印度相比,巴基斯坦面临的经济形势更为严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粮食产量不足。“巴基斯坦粮食一向不充裕,每遇粮欠即闹粮荒。粮食产量忽高忽低,波动很大。立国以来,其最高年产量(1953-54)为1,421万吨(内杂粮132万吨),最低年产量(1952-53)为1,191万吨(内杂粮135万吨)。”^[4]粮食问题成为巴基斯坦政府必须面对而又很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52年冬天,巴基斯坦又因为遭受旱灾而引起饥荒,粮食短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向巴基斯坦伸出了援手。“1953年6月25日,总统签署小麦援助法令,6月26日,第一批小麦从巴尔的摩港出发,仅1953年,美国就给巴基斯坦提供了700000吨小麦,这些小麦帮助巴基斯坦度过了饥荒。”^[5]美国此举解了巴基斯坦的燃眉之急,巴基斯坦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美国朋友”的友好。

[1]《我对巴基斯坦进步分子筹备组织巴中友协的意见》(1951年9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80-01。

[2]《巴中友好协会贺电》,〔北京〕《人民日报》1951年10月9日。

[3]《外交部就出席巴中友协招待会事电示我驻巴基斯坦使馆》(1951年12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080-02。

[4]《巴基斯坦当前经济上的若干问题》(1956年10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4-00531-06。

[5]李晓妮:《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研究:1941-1957》,〔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另外,独立后的巴基斯坦面临着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两国纷争的根源是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在不断的纷争中,巴基斯坦因为军事实力不如印度,时时感到来自印度的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曾一度寄希望于联合国的调停。但是从1947-1953年,“联合国历时五年的‘调解’和干涉,使印、巴关系更趋恶化,两国政府和舆论不断互相指责、谩骂,巴基斯坦时常叫嚷要对印度发动‘圣战’以‘解放’克什米尔,印度则以重兵驻扎克邦边境”^[1]。

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在美国的斡旋下,1953年7、8月间到1955年5月,印巴两国总理举行了直接会谈,但仍没有任何结果^[2]。在这样的情况下,“1953年印巴总理会谈成果遭到破坏后,巴即与美国积极进行军事援助的谈判。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美援来加强自己在克什米尔纠纷中的实力。1954年继签订土巴、美巴军事协定后,同年9月,巴基斯坦正式参加了马尼拉条约。这样,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日益依赖美、英,美国也开始‘援’巴兴建和扩建巴军事基地”^[3]。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巴基斯坦一改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走上美巴结盟的道路,既有着现实因素的考虑,同时也有着深深的无奈。1954年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纪念日这天,巴基斯坦就其外交政策发表了公开声明。声明称:“为了自卫和发展,这个国家必须从那些准备并且愿意给予援助的别的国家寻求援助而无损于其独立,不能找到比美国更好的盟国了。”^[4]在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下,出于种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巴基斯坦倒向了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一边。

(二) 中巴关系受到的影响

美巴结盟后,巴基斯坦受美国敌视新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做出了许多不利于中巴友好的举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待一个中国问题立场不坚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别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和条件。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巴基斯坦一度在这个关系新中国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立场不坚定,甚至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巴基斯坦举办第三届国际工业展览会(原定于1954年10月举办,后因故拖延到1955年3月,后又拖延至1955年9月),并邀请中国参加。但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却意外地发现,巴基斯坦工业展览会散发的广告把新中国的国旗绘制成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旗帜。

对于此事,1954年9月24日^[5],1954年9月28日^[6],1954年9月29日^[7],韩念龙分三次向中国外交部进行了汇报。之后中巴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一次交涉,但巴方认为这是偶尔选择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旗帜作为插图,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侮辱或者不尊重^[8]。在这样的前提下,巴方认为更正的问题自然就不会产生。

这当然是新中国所不能接受的,也是违背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建交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决定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出面复照巴基斯坦外交部对其进行驳斥,并在1954年12月1日,由章文晋副司长约见巴基斯坦驻华使馆代办再次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交涉。

在中国政府表示出明显的抗议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政府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954年12月3日再次复照中国外交部,就此问题进行了解释:“外交部方面的这种陈述过去,并不存在亦不意味着如大使馆在其每次照会中所推测的巴基斯坦政府在任何方面承认福摩萨政府。”^[9]并希望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对这样的一个无关紧要的事件将不会给予过分的重视。”^[10]

[1][2][3]《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调研资料》(1956年3月1日-1957年12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450-02。

[4]《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1954年8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32-01。

[5][6][7][8][9][10]《关于巴基斯坦邀请我参加巴第三届国际工业展览会事(附小册子一本)》(1954年10月16日-1955年10月17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0194-01。

第二,在亚非会议筹备阶段反对新中国参加亚非会议。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会议,这次大会对新中国展示自己的形象和消除那些不了解新中国的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疑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会议召开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阻挠会议的正常召开和新中国参会。受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在亚非会议的筹备阶段,巴基斯坦对新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1954年12月25日,郑为之代办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报告,报告说巴基斯坦“借反对‘成立削弱联合国地位的集团’、反对大国影响亚非会议等名目反对我国参加”^[1]亚非会议。“打着‘建立强有力的亚非国家集团’的旗帜贩卖‘东南亚公约’、‘巴土协定’的货色,但避免正面提出要亚非国家讨论是否参加上二项问题。”^[2]1955年1月14日,郑为之续报巴舆论的反应,说巴国内除了一些正面的声音外,依然充斥着反对中国参加会议的声音。“九日喀喇噠时报称,我被邀为‘最大的惊奇’,是‘中国和印度的胜利’。”^[3]

第三,巴基斯坦主要领导人发表反华言论。1957年7月,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访美,要求美国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访美期间,苏拉瓦底发表了露骨的反华言论^[4]。他在7月19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竟然附和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敌视中国人民的言论,具体地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要消逝的东西’,并且说,‘中国共产主义’‘正处在演变状态中’。^[5]苏拉瓦底的反华言论和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反映,说明当时苏瓦拉底的言行已经触动了和新中国关系的底线。

继苏拉瓦底之后,1958年,巴基斯坦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成为巴基斯坦第一个军人统治者。阿尤布·汗上台以后,其在外交上亲美的倾向更加明显。在他的努力下“尽管美国政府受到一个强大的亲印游说集团的影响,他使美国人相信同巴基斯坦结盟的战略价值。其结果是1955年签订的美巴之间的共同防务条约”^[6]。特别是在阿尤布·汗执政初期,其亲美的外交政策十分明显,其做出了许多不利于中巴关系发展的举动,中巴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巴基斯坦做出的这些不利于发展中巴友好关系的举动,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巴关系的深入和加强。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对1955至1956两年间中巴之间交往的报道往往比较详尽,对举办的某些活动的报道更是浓墨重彩,力图展现出交往或活动的全貌。但到了1957年、1958年、1959年这三年,受到巴基斯坦亲美外交政策的影响,中巴之间的友好交往锐减。1957年^[7]、1958年^[8],中巴之间的往来各仅三次。到了1959年,中巴全年的往来降到了两次^[9]。并且由

[1][2][3]《我驻巴基斯坦使馆报回巴基斯坦对亚非会议的态度等问题的电报》(1954年12月5日—1955年2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7-00002-01。

[4]《苏拉瓦底乱弹琴 发表媚美反共演说》,〔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7月19日。

[5]《不要忘记原则》,〔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7月24日。

[6]〔巴基斯坦〕阿尔塔夫·高哈:《阿尤布·汗——巴基斯坦首位军人统治者》,邓俊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7]《巴经济农业水利考察团应邀来访》,〔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9月27日;《我艺术团赴巴参加国际文化节》,〔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0日;《应邀参加巴基斯坦文化节 我国艺术团在卡拉奇演出》,〔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11月22日;《中国伊斯兰教代表团去巴基斯坦》,〔北京〕《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4日。

[8]《我国援助巴基斯坦的牛痘苗由北京运出》,〔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帮助巴基斯坦扑灭天花霍乱我捐送疫苗全部运抵达卡》,〔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6月15日;《我国和巴基斯坦 签订贸易协定》,〔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巴中友协拉合尔城分会会长到北京》,〔北京〕《人民日报》1958年6月14日。

[9]《巴基斯坦社会名流 伊斯巴哈尼夫妇到京》,〔北京〕《人民日报》1959年9月28日;《巴基斯坦社会名流阿克巴尔·汗到京》,〔北京〕《人民日报》1959年9月29日。《巴基斯坦医师 阿齐兹·汗等到京》,〔北京〕《人民日报》1959年11月15日。

于受到中巴两国关系大气候的影响,这三年间《人民日报》对中巴活动报道的详尽程度明显不如1955年、1956年两年。

三、中巴关系的转折及两国事实同盟的形成

中巴关系在经历了美巴结盟所造成的低谷后,在主客观因素的交织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逐渐回暖^[1]。1963年3月,中巴边界协定的签订,则标志着中巴双方之间的这种互相信任和友好合作关系最终得以确立,这也意味着中巴关系结束了之前的低谷时期,开始迈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代,这在中巴关系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2]。之后随着巴美关系继续疏远,巴印关系继续紧张,中巴关系则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中巴结成了事实同盟。

(一) 巴美关系疏远

1. 在经济援助问题上巴美矛盾不断激化

1964年4月29日,根据中巴之前签订的航空运输协定,两国之间的直达民用航线正式开航,这对中巴双方都是十分有利的事情。美国对此却十分不满,中巴通航以后,美国方面决定停止向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正在修建的机场提供贷款,但巴基斯坦方面并没有屈服。1964年6月10日,巴基斯坦官方宣布,“美国政府停止向东巴基斯坦省府达卡的机场修建工程提供贷款之后,巴基斯坦已经决定自己出钱来修建这个现代化的飞机场”^[3]。美国方面还直言不讳地扬言要巴基斯坦听命于美国,否则就要利用经济援助来对巴基斯坦进行威胁。“我们已经警告巴基斯坦政府,它向北京靠拢将会在我们的支持计划中得到反映。”^[4]

1965年初,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问中国,更是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反感,美国决定延期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巴美矛盾加剧。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在同年7月15日、7月16日、7月19日、8月1日连续四次发表演说,不满美国延迟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表示巴基斯坦不会牺牲主权、牺牲同中国的友谊来换取美国的援助^[5]。

2. 美国“重印轻巴”的政策明显

美国从肯尼迪政府起,就开始对印度进行援助。美国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增强印度的力量来对抗中国,但是在巴基斯坦看来这无疑是对巴基斯坦巨大的威胁,因此对美国极度不满。

1964年6月6日,印度国防部长恰范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会谈后宣布,美国决定给印度大

[1]参见韩晓青:《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基斯坦从根本上改善巴中关系的原因探析》,〔北京〕《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

[2]参见韩晓青、齐鹏飞:《20世纪60年代巴基斯坦积极推动中巴边界谈判之动因分析》,〔北京〕《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韩晓青:《中国与巴基斯坦解决双边陆地边界问题外交谈判的历史考察》,〔北京〕《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6期。

[3]《不向美元屈膝 决心依靠自力 巴基斯坦宣布自建达卡机场 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6月19日。

[4]《巴基斯坦报纸强烈抨击美高级官员威胁 中国友谊抵得上美国一切贷款 巴决不会接受附有政治条件的任何援助》,〔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7月4日。

[5]《美国公然决定延期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 布托外长严正表示不向外国压力屈服 指出巴基斯坦正在奉行越来越不依靠外援的政策》,〔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7月15日。《阿尤布总统指令主要依靠本国力量满足国家经济需要 巴基斯坦满怀信心准备面对任何局势 全国对美推迟“援助”极表愤慨决心不在美帝压力下屈服 卡拉奇大学学生举行反美示威高呼美国“援助”见鬼去吧》,〔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7月19日。《巴基斯坦人民愤怒反对美国利用“援助”施加压力 卡拉奇市民和达卡学生举行反美示威 阿尤布总统任命紧急委员会调整发展计划应付美国压力》,〔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7月21日。《反对美国利用“援助”施加政治压力 巴基斯坦举国激愤纷纷举行示威游行 阿尤布总统重申巴基斯坦独立和主权不容损害》,〔北京〕《人民日报》1965年8月3日。

量长期军事援助,这更加剧了巴美之间的矛盾。1964年6月13日、14日,布托两次发表谈话,表示对美国对印度进行军事援助的不满。他向记者表示,“美国的这一决定,还将加剧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使两国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更加困难”。“美国向印度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决定,‘是一个使我们将不得不加以考虑和作出调整的决定’”^[1]。他在巴国民议会也表示,鉴于美国向印度提供长期军事援助,“巴基斯坦重新估计它的外交政策和检查它的政治和军事义务的时候已经到来。”^[2]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也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增加对印度军事援助的不满和谴责。“美国给印度的军事援助‘将被用来使它能够对邻国进行威胁,而首当其冲的是巴基斯坦。’”^[3]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美国从“印巴联合、共同对抗中国”的战略目标出发,决定给予印度长期的军事援助,而在巴基斯坦看来,印度军事力量的加强首先是对巴基斯坦的严重威胁,巴美矛盾进一步加深。

3. 美国企图换掉“不听话”的阿尤布·汗

巴基斯坦在阿尤布·汗的领导下,外交政策中的独立倾向越来越严重,逐渐有摆脱美国控制的趋势,美国对此十分不满,希望借巴基斯坦1964年总统选举之际换掉阿尤布·汗,推举出听自己话的新领导人。

大选开始之初,形势对阿尤布·汗是十分有利的。但真纳小姐突然宣布参加竞选让阿尤布·汗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在巴基斯坦,“真纳小姐,伟大领袖的妹妹,是位德高望重的女士,在全国深受尊敬”。真纳小姐的出现,事实上是美国策动的结果。一些亲美的旧政客于九月十七日突然抬出真纳小姐(巴建国人真纳之妹,巴人称之为‘国母’)作为反对党‘联合阵线’的总统候选人,进而公开要求阿尤布·汗‘让位’。”从上可以看出,美国为了换掉在外交上主张走独立自主路线的阿尤布·汗,才鼓动几个反对派联合起来,并且说服真纳小姐这个在巴基斯坦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出面和阿尤布·汗进行竞选。

真纳小姐最终竞选失败,阿尤布·汗再次当选。总统选举之后,巴美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二) 巴印关系的恶化

1. 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谈判无果

对于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一直想求得和平解决。1964年2月3日至17日,为了求得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巴基斯坦的要求举行会议讨论克什米尔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强调,“巴基斯坦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今后也永远不会承认印度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领土的要求”。“布托重申了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但印度代表“查格拉拒绝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建议,他强调克什米尔是‘印度领土’。”^[4]

此后应巴基斯坦的要求,安理会在1964年3月17日、20日再次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会议。因为印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协定推迟到5月份进行。5月份的讨论仍没有结果。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在五日的会议上发言时重申巴基斯坦的立场说:克什米尔问题唯一正当的解决办法是实现安理会早先的决议,这项决议要求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印度代表查格拉在七日的会议上发言攻击巴基斯坦

[1]《布托外长指责美国援印加剧印巴关系危害亚洲安全 强调巴基斯坦不会屈服于美国威胁》,〔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6月16日。

[2]《美国援印危及亚洲和平并妨碍克什米尔问题解决 布托说巴基斯坦必须重新估计外交政策 巴国会议员和公众强烈谴责美国破坏亚洲和平团结的政策》,〔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6月28日。

[3]《阿尤布汗总统抨击美国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使邻国受到威胁 巴基斯坦公众舆论强烈谴责美国援印危害亚洲和平》,〔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7月2日。

[4]《安理会讨论克什米尔问题未获结果 巴外长重申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的要求》,〔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2月21日。

坦,并且提出许多同克什米尔争端毫不相干的问题。”^[1]此后从1964年5月5日至18日,安理会再次讨论了克什米尔问题,但“会议在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的情况下休会。安理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三个月”^[2]。丝毫看不到克什米尔问题获得解决的迹象。

巴基斯坦和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各持一端。巴基斯坦强调应该通过公民投票来解决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印度强调巴基斯坦加入两个条约组织后,原来的公民投票原则已经不适用,克什米尔已经是印度的一个邦,不存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了。印巴双方各持己见,关系紧张。

2. 印巴之间的教派冲突不断

印巴分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信仰的不同,两国之间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教派冲突和种族仇杀。1963年底,在印占克什米尔地区发生了先知圣发被窃的事件,虽然此后印度方面迅速派出警察进行破案,并把先知的圣发重新安放,但是还是引起了持续性的宗教冲突和种族仇杀。

印巴之间正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最终选择了分治,建立了不同的国家。教派冲突的发生十分容易引起全国性的动荡局势,这就导致本身已经恶化的印巴关系因教派冲突仇杀继续恶化。

3. 印度不断加强军事力量引起巴基斯坦的担忧

克什米尔争端的存在,教派冲突的加剧,使印巴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而随着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发生,印度加强了自身的军事力量,这在巴基斯坦看来无疑是对巴基斯坦的严重威胁,印巴关系雪上加霜。

1964年2月20日下午,阿尤布·汗在和周恩来的谈话中表示:“武装冲突的结果很不幸的是你们宣布了停火,印度从西方得到了援助,但是它不能把援助用于反华,就把它用来反对巴基斯坦和其他亚洲小国家。冲突的结果反映到我们身上来了。”^[3]可见巴基斯坦十分担心印度用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来对付自己。

此时又发生了印巴互相驱逐外交官的事件。1964年12月18日,据中国驻巴使馆报告说:“十七日巴礼宾司长(查)坦塔里召见印高专帕塔萨拉蒂,面交一照会限令印二秘约希于24小时内离境,因其‘进行与本身业务不相称的非法活动’。”“据说巴方酝酿驱逐约希之举不久前即为印方获悉,印方先下手为强在德里制造了‘巴间谍集团’案件,并由印外事秘书于十六日召见巴高专,勒令巴二秘穆罕默德离境。”^[4]

随着印度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以及印巴之间互相驱逐外交官事件的发生,巴印矛盾更加恶化。1965年1月6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再次当选后,在谈到外交政策时说:“关于巴印关系,他说,‘我们是印度的第一号敌人’。”^[5]

(三) 中巴事实同盟的建立

巴美、巴印关系不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巴双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一时期中巴双方没有签订法律意义上的协议,但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同盟。

1. 中巴军事方面合作的加强

[1][2]《安理会讨论克什米尔问题未获结果 巴外长警告印度不得镇压克什米尔人民 印代表坚持要吞并克什米尔并无理攻击巴中友好》,〔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5月21日。

[3]《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外长布托会谈记录》(1964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635-01。

[4]《巴基斯坦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夏希面交驻巴大使丁国钰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备忘录、巴向我通报巴总统阿尤布与印度总理夏斯特里会谈情况》(1964年10月9日-1964年12月1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260-04。

[5]《巴基斯坦对政策动向(笔者注:原档如此,可能少一个“外”字。》(1965年1月1日—1965年2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66-01。

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不允许印度的飞机从巴基斯坦领空飞越,在军事方面给予了中国间接的支持和帮助。1964年2月20日,周恩来在和阿尤布·汗的谈话中说:“感谢阁下政府和阁下拒绝印度飞机飞越巴基斯坦领空,它只好从东方、从泰国、从美国在日本的基地飞了。”^[1]

1964年2月20日,周恩来在同阿尤布·汗谈话中表示:“我们不相信印度的侵略战争能够胜利。它敌视我们两国,可是他不得不看一下客观情况。他要发动任何侵略都必须考虑到我们两个国家。你们的布托外长昨天答记者问答得很好。他说我们两国不需要签订什么互不侵犯条约或盟约。这是很对的。”^[2]阿尤布·汗表示,“我很高兴阁下了解这点”^[3]。周恩来接着说:“印度的军事力量是不能超过我们两国。他对任何一国发动侵略都要考虑到另一个因素。尽管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条约,在客观上我们之间是有联系的,打开地图来看情况也是如此。”^[4]中巴双方在军事上的互相配合和支持,无疑是中巴两国事实同盟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巴两国无需缔结形式上的同盟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但在实质上已经形成了同盟关系。

2. 中国对待克什米尔问题态度明显改变

克什米尔问题由来已久,是印巴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中国和印巴都是邻国,中国对待克什米尔问题的态度对印巴双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方面最初对待克什米尔问题持不介入的态度,但到了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中国政府开始改变了以前的立场,支持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主张。1964年2月23日,中巴双方签订了《中国巴基斯坦联合公报》,公报的第七条有这样一段话,周恩来总理和阿尤布·汗总统,“他们表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够像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5]。1965年4月21日,中国外交部的文件也承认这样的表态是带有倾向性的。“一九六四年二月,总理、陈总访巴时,我对此问题作了倾向性的表态。在中巴联合公报中,双方表示‘希望克什米尔争端能够象印度和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人民所保证的那样,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获得解决’。”^[6]这标志着中国改变了其之前对克什米尔问题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开始转而支持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方面对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的改变是十分感激的。1964年10月30日深夜,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和到访的陈毅副总理的谈话中表示:“自从上次中国领导人访巴以来,中巴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巩固,两国领导人曾讨论了共同有关的问题。中国对克什米尔问题发表了声明,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中国主持正义,获得了巴人民的赞佩。”^[7]

3. 中国对巴基斯坦加入两个条约组织表示谅解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英牵头组织策划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两个条约组织主要是针对中国和苏联的,巴基斯坦先后加入了这两个条约组织。中国起初对巴基斯坦加入这两个条约组织是不满的。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1965年3月3日,刘少奇在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时说:“巴基斯坦过去的国家领导人曾向我们解释,巴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主要是对付印度,不是对付中国。

[1][2][3][4]《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外长布托会谈记录》(1964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635-01。

[5]《中国巴基斯坦联合公报》,〔北京〕《人民日报》1964年2月25日。

[6]《克什米尔前总理阿卜杜拉生平及克什米尔近况》(1965年4月12日-1965年4月2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362-02。

[7]《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途经巴基斯坦时同巴外长布托的谈话记录》(1964年10月30日-1964年11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877-01。

那时我们不大相信。”说到这里,刘少奇话锋一转接着说:“近年来,特别是阿尤布总统执政以来,两国关系有了更大的发展。虽然东南亚条约组织主要是对付中国,但巴基斯坦的政策同美国不一样。巴一方面成员国,另一方面,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这是违反美国意愿的。我们谅解你们,相信你们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为了对付印度的。”^[1]刘少奇还表示:“现在我们完全谅解。你们留在东南亚条约组织里基本上没有害处,可以起建设性作用,可以在内部牵制美英。”^[2]刘少奇的讲话表明,中国对巴基斯坦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态度已经发生明显的转变。

总之,随着巴美、巴印关系的恶化,中巴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开始具体合作,中巴之间事实同盟关系已经形成。正如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欧洲、亚洲十四国的报告中所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正确的政策,积极地做工作,推动巴基斯坦对东南亚集团发展离心倾向,并且在东南亚团结其他对印度不满的国家,巴基斯坦有可能逐步摆脱美国的控制,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对于打击印度反动派、粉碎美帝和苏修在东南亚孤立中国的阴谋、加强亚非国家团结反帝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可以作为我们间接的同盟军。”^[3]

四、结 语

迄今为止,中巴两国正式建交已经60余年。其中,1951年至1965年这一时段中巴关系的发展演变,在整个中巴关系发展史上,是最富有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巴关系与新中国和其他周边陆地邻国的关系相比,可谓是新中国睦邻外交的成功范例。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时期中巴关系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首先,发展中巴关系的基础并不是特别好。巴基斯坦作为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社会制度上都和新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下,这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因此建交之初两国关系并不是十分友好。其次,巴基斯坦一度加入了美英等西方国家主导的针对新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而新中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两国所处阵营的不同更给中巴关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另外,与同一时期对中苏、中越、中印、中朝等国关系的处理相比,新中国在处理中巴关系时投入的物力和财力要少得多。

面对如此不利的条件和复杂的情况,新中国主要依靠着正确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对中巴关系进行了妥善的处理,赢得了巴基斯坦的友谊和支持。1951-1965年间的中巴关系,在中巴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中巴关系正是经历了这一时期,才逐渐形成今天这种“全天候的朋友”关系。对这一时期中巴关系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不仅对弄清楚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由来,而且对继续维持并推动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钱继秋]

[1][2]《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访华(七):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同阿尤布会谈记录》(1965年3月3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5-01927-08。

[3]《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欧洲、亚洲十四国报告提纲(稿)和附件》(1964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3-00494-01。